

GOU TONG DE TAN SUO

沟通的探索

——西方文学与文化论稿

吴锡民 ●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吴锡民 著

沟通的探索

西方文学与文化论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沟通的探索

——西方文学与文化论稿

吴锡民 著

责任编辑：陶 征 贺 为

封面设计：林晓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插页：1 字数：181千字

1996年6月第一版

1996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ISBN7—5633—2211—6/1·178

定价：8.80元

目 录

导言 西方文学与文化沟通论	(1)
一 文学与文化	(1)
二 开放与闭锁	(3)
三 切入点与脚手架	(8)

上篇 文学与审美文化论

第一章 西方文学与音乐	(11)
一 文学与音乐历时性互通	(11)
二 文学与音乐共时性合作	(12)
三 文学与音乐互惠性条件	(20)
第二章 西方文学与绘画	(23)
一 文学与绘画关系探讨的理论起点	(23)
二 文学与绘画的“亲昵”现象	(25)
三 文学与绘画的“交流”透析	(28)
四 文学与绘画关系探究的启迪意义	(34)
第三章 西方文学与电影	(36)
一 “对立论”“排他论”过于偏颇	(36)
二 文学与电影交往事实胜于雄辩	(38)
三 区别·关系·新质	(43)
第四章 西方文学与建筑	(47)

一	文学与建筑沾亲带故	(47)
二	文学与建筑内在契合点	(49)
三	文学与建筑的交互作用	(51)
四	建筑感与文学性	(54)
五	文学与建筑对独具个性的美之渴求	(56)
六	文学与建筑不合拍之音“调适”	(59)

下篇 文学与非审美文化论

第五章	西方文学与哲学	(61)
一	文学与哲学关系上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61)
二	哲学对文学的冲击	(62)
三	文学对哲理的探求	(65)
四	哲学的独特魅力	(68)
第六章	西方文学与新闻	(73)
一	文学与新闻相互交融之现象	(73)
二	文学与新闻理论纷争之辨析	(74)
三	强调·反观·认识	(82)
第七章	西方文学与法	(84)
	西方文学与法(上)	(84)
一	文学涉足法的疆域	(84)
二	是否有非审美化之嫌	(88)
三	审美主体的创作秘诀	(91)
	西方文学与法(下)	(95)
一	问题的缘起	(95)
二	法对文学的干预有无必要	(96)
三	是否可用法来裁决文学道德是非	(99)
四	如何判定文学中的色情问题	(102)
五	法律干预是否会挫伤作家的创造精神	(104)

第八章 西方文学与科学	(108)
一 文学与科学交互融通的理论基石	(108)
二 文学与科学事实联系的立体梳理	(109)
三 文学与科学撞合互惠的理性思辨	(117)
第九章 西方文学与史学——传记文学浅论	(120)
一 传记文学的生存基因	(120)
二 传记文学的发展轮廓	(123)
三 传记文学的理论纷争	(126)

续篇 文学与其他文化现象余论

第十章 西方文学与商品经济	(133)
一 “缪斯女神”与“经济提坦”	(133)
二 经济规律与文学主体创作动因	(136)
三 社会经济运动与文学主体物化成果	(139)
四 诘问·意向·参照·体验	(141)
第十一章 西方文学与疾病	(143)
一 文学与疾病联系之事实描述	(143)
二 文学与疾病联系之奥秘刍议	(145)
三 文学与疾病联系之意义体悟	(151)
第十二章 西方文学与原始主义	(154)
一 何谓原始主义	(154)
二 西方文坛之反映及其表现	(156)
三 “复古”现象的文化心理	(158)
四 “返祖”文化心理意味之驱力	(161)
第十三章 西方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	(167)
一 诺贝尔与文学	(167)
二 西方获奖者与诺贝尔遗嘱精神	(169)
三 “他们”——我们与诺贝尔文学奖	(174)

结语 沟通之路远没走完——以西方文学与宗教为例

..... (179)

一 沟通之路与“浮士德精神” (179)

二 文学与宗教之比较 (180)

三 深入认识文学与宗教关系上的两重特性 (183)

四 正确评价文学创作与宗教之关系 (185)

附：译文篇 (191)

社会学与文学.....〔英〕F.R.利维斯 (191)

文学与社会.....〔美〕戴维·戴希斯 (199)

文学与宣传.....〔德〕A.P.福克斯 (204)

文学与真诚.....〔美〕亨利·佩尔 (209)

后记 (217)

导言 西方文学与文化沟通论

其实沟通并不是在当代新发现的问题，而是现在流行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我们时常用它来解释一切问题。

——理查德·麦基翁^①

世界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事物之间的联系与沟通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在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上也同样存在着令人着迷的沟通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对探究西方文学发展规律、吸收人类发展的文明成果，亦是很有意义的。

一 文学与文化

什么是文化？这是个聚讼已久的难题。它作为一个科学术语，1920年以前只有6个不同的定义，而在1952年便增至160多个，迄今，更远不止这个数字了。如果单从字面词义上去看，

“文化”一词在西方语言中为culture（英、法文）或kultur（德文），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意为“开垦”、“耕作”、“种植”、“栽培”、“照料”、“培养”等，这与古代农业社会的发展有关。倘若从西方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家，甚至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的理解来看，众说纷纭。有的说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长期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有的认为是指与物质文明相对的精神文明；有的则强调区别于经济、科技、教育的文化艺术的活动……如康德给“文化”所下的定义是：人类脱离其

^①（美）唐·库什曼、杜·卡恩：《人际沟通论》，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页。

自然的“粗野状况”，在精神、心灵和身体上的“自然性”进步发展；在这种发展中，人由被自然状况的控制进化到对自然状况的控制。在康德心目中，“文化”对于人类来说主要是道德上的意义。“文化”的完整意思就是指人类使其行为目的以道德标准为基础，符合而且有益于社会伦理规范。文化“最外在的目的”则是确立一种“根据人权而制定出的国家宪法”。这种法律秩序为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的标准体制提供了保障。赫尔德认为，“文化”乃是一种“较高的自然”，它作为各民族的生活方式而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成熟起来。在“文化”中，一个民族的“人道”能够得以充分展开，直至其“全盛时期”。然后，它就像生物那样逐渐逝去，让位给新一代。赫尔德的这种文化的“人道理想”观中的“文化”，只是指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精神成就的总和，或对整个人类精神成就的规范总结。

关于“文化”的解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出他们回答的角度不同或他们对文化本身的界定不甚明确，更重要的是，说明了文化本身内容十分复杂，甚至其内涵与外延亦不甚明晰。因此，眼下要对文化下个令所有的人均能接受的定义实在难以办到。不过，在学术研究中，任何概念都允许某种朦胧。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比较乐意接受英国文化人类学创始者泰勒（Tylor, 1832—1917）的说法。泰勒是近代第一个在人类文化学中引用“文化”这个名词的人。他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中将“文化”概括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这将包括典章制度、民俗风尚、科学技术、宗教信仰、政治、伦理、文学艺术等。当然，我们在此亦可参照国内《辞海》的释义。文化的“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①这两个定义是否科学、公允，我们姑且不作定论，但有

^① 《辞海》（下），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第4022页。

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亦是许多关心“文化”概念建设的方家智者一般能达到共识的，那就是：文学是文化家族中的一员。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几乎都是有机的整体。它们各成系统，同时又互成系统。任何一个系统，都和它周围的环境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因此，任何一个系统都是较其更高一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要素（或成分）；同时，任何一个系统要素（或成分）的本身，往往又是较其低一级系统的母系统。而“文化的特征是它的各种成分之间的组织性、系统联系”。这就意味着：“文化永远是某种整体，它的所有成分——子系统、方面、水准、成分——处在相互作用、互为中介、相互反映的状态中。”^①据此，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亦就自不待言了。

二 开放与闭锁

在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上，显而易见是子系统与母系统的关系。但作为子系统的文学，它势必有着其他学科系统不可替代的个性特征。因而认识其审美价值应当把它投放到一种非常重要的、本质的意义上去认识。因为文学毕竟是文学。不过，话还得说回来，文学本身又不完全是文学，不仅仅是文学。系统论相关性原则告诉我们：任何系统都不可能是绝对封闭和静止的，它们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也总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物质、能量、信息等）。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对象时，要把研究对象投放到一个更大的更高层次的系统中去考察；要求我们去考察被研究对象与周围系统的联系。我们通常说，“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就是因为文学无不受社会其他方面的因素浸染所致。那么，我们研究文学时，务必采取一种开

①（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266页。

放性的态度，有必要对其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探究。

西方文学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因子。西方文化，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无论是物化了的精神产品，抑或是日常生活的风情习俗，它们经过历史的积淀，成为某一国家人们的行为模式、处世规范、思维方式或心理特征，进而由此构成一个国家的思想风貌，凝聚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智慧。西方文学（包括作家作品）是这种风貌和智慧的最全面、最敏感、最生动的体现。它不是以一个僵死的自然物的面目出现；相反，它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庞大的象征载体，蕴藏着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乃至文化的全部奥秘。

比如说：风靡欧洲的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为什么在英国达到了鼎盛阶段，在法国则姗姗来迟，而在德国，占主导地位的依旧是歌德和席勒的“古典主义”文学？过去，我们在解释这种不平衡性时，往往热衷于强调其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外在原因，而对其内因似乎视而不见。殊不知，外因终将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其实，它与德国人重玄学（形而上学）、法国人重观念（思想意识）、英国人重想象的民族人文传统亦有不可低估的联系。又比如说：我们对为数众多的西方文学大师的创作秘诀的探讨，至多走到他们艺术实践世界这一步；而对他们自身丰富的个人感情生活对创作力的影响则过问极少，好像只能在他们的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中才能找到答案。殊不知违反了一个公理：人为地割裂了一个文学家的创作活动和其个人的私生活。事实上，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艺术实践成功的背后不乏女性文化的馨香。宛如天使般的贝亚德丽采成了但丁进入“天堂”的引路人；身世孤苦的名妓阿尔芳斯不独孕育了小仲马最著名的小说，使小仲马开始了真正的艺术生涯，而且，整个地改变了一个人，影响了小仲马的一生；贵族少妇华伦夫人占据了卢梭的人生历程，使他认识了自己，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存状

态；瘦小的老妇梅森堡夫人以宁静的智慧鼓励罗曼·罗兰，酿成了罗曼·罗兰未来伟大创作生活的前奏；小迷娘贝蒂娜像一颗火星点燃了歌德的腹稿之中的“诗与真”的热情之火；年轻女工让娜的出现重新恢复了左拉曾一度衰竭的思想和文学活力；徐娘半老的帕尔尼夫人用殷勤周到的谦顺调教巴尔扎克的自信力，使其迈开走向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步。凡斯种种，假如仅仅视作风流艳事、趣闻轶谈，而不从心理、生理、伦理等诸方面作一多方位审视的话，很有可能，我们无法全面破解他们的创作力之谜。又比如说：我们分析意识流小说的艺术特征时，一般都注意到它的“音乐化”倾向。但要就此刨根究底，亦就不能不提音乐为之所作出的贡献。音乐中的“主导动机”、“复调音乐”、“赋格曲”和“奏鸣曲”等，无不渗透到伍尔夫、乔伊斯、卡彭铁尔等现代作家辛勤笔耕的字里行间。我们设若从这儿来解读他们的文学作品，就不至于如堕云山雾海，不知其所云。

西方文学中的诸多艺术之谜无疑昭示出：只靠走“单行道”的路数，即满足于对西方文学中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等，作通过什么，反映了什么，批判了什么，揭露了什么的线性描述来揭开个中的谜团，那么，其研究本身就会演化成一个自我闭锁的系统，探索将浅尝辄止，追求将裹足不前，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将随之在目光短浅、琐屑褊狭的研究俗套中磨损殆尽，说不定很容易步入“庸俗社会学”的误区。

“庸俗社会学”是什么货色，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有人曾列举过它在中国文艺界的十大表现：文艺从属于政治，以政治代替文艺；以世界现代代替创作方法；以逻辑思维代替形象思维；以倾向性代替真实性；以真善代替美；以文艺的政治方向一致性代替艺术创作的多样性；否认文学是“人学”；否定文学遗产；以政治斗争代替文艺批评；在文艺上大搞群众运动。于是乎，高、大、全的形象充斥文艺园地，一部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学史变成了

儒法斗争史。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亦概莫能外。夏洛克与安东尼奥的矛盾冲突变成了狗咬狗的斗争，现代派文学被视为洪水猛兽。整个文艺界被笼罩在文艺社会学病态的阴影之下。历史的创伤切莫忘记！历史的教训必须记取！

西方文学研究的终极指向是什么？说到底应该是促进对各国文化的了解与交流。那么，这种了解与交流的本身具体到文学与不同的文化事物的关系上，它势必给各自带来巨大的“实惠”。纵观西方文学发展的长河，仅以小说为例。如果对其发展的历史作一整体的直观，就不难发现：先是由生活故事化的展示阶段过渡到人物性格化的展示阶段；而后，再过渡到以人物内心世界审美化为主要特征的多元化展示阶段。这种变化固然有诸多方面的因素，但各种文化事物与其交往则功不可没。与此同时，各种文化事物亦从中获致不断创新的营养素。别的文化形态暂且不提，电影从文学那里受益最多。它大量借鉴了小说这一古老的形式。因为正是小说把文学遗产传给了电影，从而使它从中获得了灵感和源泉。最为明显的就是叙事或讲故事的形式。

然而，我们仅仅看到通过交流双方受益的事实，仍然是肤浅的。它们内在的交流融通点在哪里？有无规律可循？诸如此类问题大有文章可做。文化发展理论中有一条重要的法则——“互渗-统一”律。所谓文化“互渗-统一”律，就是人类文化各种内部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吸取、相互渗透并相互趋近，走向一体化的文化发展法则。作为一个开放而又统一的文化系统，它包括了不同成分的子系统。而不同成分的子系统又是一些具有相对独立的文化事物，它们之间之所以相互区别开来，就是因为它们彼此之间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质；同时，它们之所以作为文化事物，又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文化特质。文化子系统的相异性使它们各自表现为具有独特风格、形态的文化事物；其共同性又使它们在根本性质上表现为不同于自然事物的文化事物。各种文

化事物之所以能够相互交往而彼此渗透，原因就在于它们具有共性的特质。而这种特质交互作用的结果势必造成诸种文化事物的相互统一的态势。那么，在文学与周边文化事物的关系上，将它们交往的具体的具体特质挖掘出来，岂不更有助于人们对各国文化的了解与交流，从而契合西方文学研究的终极宏旨么？！

作为参照，我们很欣赏法国文坛著名女作家史达尔夫人的文化研究的总体精神。她的《论德国》把西欧文学划分为南方文学（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诸国文学）和北方文学（苏格兰、英国、德国、丹麦和瑞典等诸国文学）两大类。从自然环境、气候变化的角度观察，南方“清新的空气、丛密的树林、清澈的溪流”等生动活泼的自然界容易激起人们的思想情绪，使人们感到生活的乐趣，从而安于现状，只从“艺术的爱”和“气候的美”中取得补偿。北方“土壤的硃瘠和天气的阴沉”，使北方民族缺乏生活乐趣，容易引起生命的忧郁感并惯于哲学的沉思，使他们不能忍受奴役，而把“独立”看作是“首要和唯一的幸福”。从宗教方面考察，史达尔夫人认为宗教改革能最有效地促使人类走向完美，北方民族所信奉的宗教（基督教）比南方居民的宗教更具有哲学色彩，从而能有效地保持社会风尚的纯洁，给“人性”以“最大的幸福”。史达尔夫人从文化角度切入进行文学研究，从而提炼出了与传统文艺观迥然相异的新见解。还有，法国文艺理论家和艺术史家泰纳（Taine, 1828—1893）的《英国文学史》，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勃兰兑斯（1842—1927）的《19世纪文学主流》等都可称得上这方面实践的经典性著作。当然，他们的论说亦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但，他们的开放性的总体研究思路不能不说没有一点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我们喋喋不休地说了一大通，归结到一点，无非是想袒露这样一种思想：开放预示着新的生机，闭锁面临着亡的厄运。这不

是危言耸听。总之，我们确信：文化是博大的、深邃的、发展的，具有说不尽解不完的“斯芬克斯”之谜，而不是一个僵化的、凝固的、呆重的封闭王国！

三 切入点与脚手架

把西方文学置于西方文化大系统乃至更大的系统——西方社会来沟通其与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少有六个方面需要考察。它们是：西方文学作品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土壤，西方文学同其他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的关系，西方文学作品中所凝聚和反射的文化状貌和文化方式，西方文学中所积淀和反映的文化心理，西方文学作品在整个西方文化发展或文化冲突中的地位，西方文学中人与人的命运及其同文化的关系。也许它们还不尽全面，但个中的里里外外基本上都囊括了。

在这些课题研究中，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看，显得比较薄弱，但又最具学术前沿色彩的，要数西方文学同其他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的关系的研究了。这种研究用比较文学的术语来说，叫“跨学科研究”或“学际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y），西方文艺理论大师韦勒克则称其为“文学的外部研究”。到底如何定性，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这种横向式研究究竟如何操作。然而，就此大发议论，又不大好谈。因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再则，条条道路通罗马，它并无统一的套式。不过，就问题而言，我们认为，从西方文学的周边文化形态来考虑，将其划分为几个板块进行探究最为便捷，并且，眉目亦清楚。第一板块讨论西方文学与音乐、绘画、电影等审美文化的关系；第二板块研讨西方文学与哲学、新闻、法等非审美文化的关系；第三板块着眼于西方文学与其他文化事物（现象）关系的研究。

这一构架是否缜密，当可斟酌，但它所渴求的研究意旨是明确

的。那就是：以文学为中心，以文学为本。由此出发，深入到与其周边文化形态或文化现象中去披沙拣金，提要钩玄，弦微烛幽。至于能否富有成果地从中回归到本位，求得外延了的本体，那就要考虑脚手架（方法）的问题了。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按我们的意愿取得最佳的“文学性”研究效果，不能不思虑批评方法的选择。那么，又当如何选择呢？

20世纪在西方文学界的一些人士的眼中是所谓的“批评的时代”，批评方法层出不穷，纷至沓来，真令人有眼花缭眩之感。有人曾写过一本《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的小书，归纳出：道德批评模式，心理批评模式，社会批评模式，形式主义批评以及原型批评。在我们看来，就其运作走向而言，大体不外乎“走进文学”和“走出文学”之别。所谓“走进文学”就是注重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强调文学的形式特征、审美特性等等。如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而“走出文学”则着眼于文学的种种外部特征，力图沟通文学与周边诸学科的联系，换句话说，亦就是从文化角度来考察和研究文学。如社会学批评、原型批评。按理说这两种批评走势的出现应属正常现象。因为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审美现象，作为人类生活在作家的心灵折射，它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现在，问题在于它们往往有意或无意地以偏执一端的气派出现。泰纳、勃兰克斯等历史实证主义批评当把种族、环境、时代等影响文学发展的三大要素强调到极致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淹没了对作品本身的研究；于是，后起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以及德国的文本内在含义派等对此大为不满，便相继跳出来发难，竭力地把“文本”推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结果导致了共时性与历时性，作品与作者的关系又被割裂开来；于是，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应运而生，使批评的重心由作者、作品转向读者，因而又陷入相对主义的危险的泥潭。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拘泥于任何一种文学批评方式，来对庞杂和丰富的批评对象——文学作一览无余的总体把握，是根本行不通的。即便“走进文学”的文学批评试图考察作品的形式特征、语言发展等，你不联系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能说得清楚，道得明白吗？！在一定意义上，无论是“走进文学”的文学批评，还是“走出文学”的文学批评，它们总是和文化批评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的。再则，“文化”这一概念本身内涵又是具有那样的宽泛性和丰富性，这无疑决定了文学批评很难用一种周而全的方法来对批评对象进行评头论足。所以，要尽可能完整而又全面地解析文学这一庞杂而丰富的批评对象，就必须要求多种文学批评方式的分工合作和协同作战，否则，难以奏效。这是文学批评对象对文学批评的苛刻要求。

根据认识论学者的意见，在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方法”，可依据概括程度与适用层次的不同，划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具体学科方法这样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当属于哲学方法这个普遍而又最高一级的层次，这是毫无疑问的。它的概括程度最高，适用范围最广，适用于一切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因此，它对一般科学方法和具体学科方法具有指导作用。恩格斯曾告诫我们：“马克思的整个世界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作为指导性的方法，在文学批评乃至一切科学研究中必须坚持按其精神行事。我们在考察西方文学与周边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的关系时，同样必须立足于这一制高点。在此前提下，结合文艺学科的特点和我们问题研究的实际，有的放矢地吸纳众家方法之长处，“历史地”、“美学地”来洞开个中之奥秘。唯其如此，我们在沟通的探索中方能有所作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06页。